

冷板凳上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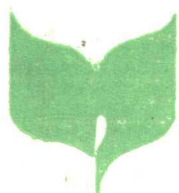
公今度

武汉出版社

冷板凳上的话

公今度

武汉出版社



LENGBANDENGSHANGDEHUA

冷板凳上的话

LENG BAN DENG SHANG DE HUA

公今度 著

*

武汉出版社 出版发行

(武汉市江岸区三眼桥一村附160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经销

武汉市汉桥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25 120千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 500册

ISBN 7—5430—0058—X/I·10

定价: 1.95元

目 录

热心的冷言冷语（代前言）	（ 1 ）
法乎上 求其高	（ 3 ）
“模糊学”的变种	（ 5 ）
干而论道	（ 8 ）
“南郭乐队”及其听众们	（ 10 ）
“相轻”“相捧”异同论	（ 12 ）
因华恰而想到的	（ 15 ）
“难得”也不要“糊涂”	（ 17 ）
一任珠帘闲不卷	（ 19 ）
也立一个公式	（ 22 ）
题目不妨倒过来出	（ 25 ）
答案	（ 27 ）
山水及山水以外	（ 29 ）
话筒无需抢 实事要多做	（ 31 ）
别错做了“青”“白”眼	（ 33 ）
对“一刀切”也不要一刀切	（ 36 ）
新武侠小说的断想	（ 38 ）
对“探索”的探索	（ 42 ）
“半路出家”也无妨	（ 44 ）

“自己动手”	(46)
《魂兮归来》释疑	(48)
求全乎？求缺乎？	(50)
人文比较学	(52)
“各就位”的引伸	(55)
女杰逝去之后	(58)
以“？”取人	(60)
学凋丹青未嫌迟	(63)
高老太爷之“乐”	(65)
冷水浴启示录	(67)
包裹——雨伞——我	(69)
牛二战法种种	(71)
“冷水浴”续录	(73)
“摘牌子”正风气	(75)
“却嫌脂粉污颜色”	(78)
对“争议”的争议	(81)
无需继承的遗产	(83)
随“灰狗”奔驰	(85)
让林黛玉更可爱	(88)
赞“解难释疑”	(91)
学到老和到老学	(93)
“抽屉”的研究	(95)
“扫地”的“哈夫派”	(97)
海阔凭鱼跃	(99)
“八分邮票”的利弊	(101)
并非袒护“让步政策”	(103)

允许“势可两立”	(105)
“嚶其鸣矣，求其友声”	(107)
同行的祝贺	(109)
“闹猛”之“轧”与“不轧”	(111)
没福消受	(113)
食洋不化与因噎废食	(115)
且看下文	(117)
观而不止	(119)
拙立名目	(121)
所见“浅表层”	(123)
治痼疾	(126)
教师啊，教师！	(128)
拥被听春雷	(130)
闲话“皇帝”	(133)
一个矛盾现象	(136)
说了大话胆就小	(138)
“瓷书”记	(140)
三分话与一片心	(143)
学鲁迅这支笔	(145)
非名人的非名言	(147)
“心之官”的复苏	(149)
“听话”别议	(151)
缆车的联想	(154)
教师节的遗憾	(156)
瞿塘双崖与倒金字塔	(159)
“女人扮男人”质疑	(162)

说“宽”道“严”	(164)
也谈“费厄泼赖”	(166)
理直气壮	(168)
关于杂文的杂文	(170)
能不模糊最好	(173)
摇篮曲	(175)
爆竹声声	(177)
“挤车人”心态	(179)
是常招，是绝招	(181)
也算一朵“朝花”	(183)
探“逆反心理”	(186)
“拿来”与“送来”	(188)
“荡马路”随想	(190)
学风掠影	(192)
后 记	(194)

热心的冷言冷语

——代前言

我为外省一本杂文集写过一篇序言，用了一个题目叫做：《冷板凳上的话》。坐在冷板凳上，冷眼向洋看世界。冷，清醒警人。只要心不冷，冷眼旁观，说不定还可以看得清晰和真切一点，看得更深刻一点。

“冷板凳”的典故是这样来的：那还是在四年前，几个杂文界的老前辈，在一起聚谈杂文的不景气。林放同志说：

“杂文是坐定了冷板凳的”，意思大概是指“有刺无花”的杂文不受有些人的欢迎和重视罢。后来他把这话写成文章，收在《未晚谭》中，题目就叫：《坐定了冷板凳》。

杂文之遭受有些人的歧视，这是由来已久的了。但同时，也一直有为杂文争一席之地的呼叫。这种呼叫也可以说是和杂文与生俱来。从鲁迅开始直到普通的大中学生，偏爱杂文的大有人在。正因为如此，也有人说杂文园地的荒芜，倒不在于“板凳冷”而是由于“板凳少”。总之，就那时而言，杂文比起当时的其他文学样式和比起现在的光景，确实是要

落寞得多。然而，这几年终于有了变化。

我虽然并不象有些同志那样乐观地认为“杂文的春天”、“杂文的黄金时代”已经来到；但却也觉得杂文是较前兴旺了。或许可以说：板凳依然冷如故的话，少，总算是不少的了。报章杂志大批地诞生，几乎都辟有杂文一栏。客观需求促使某种规律发生了作用。杂文创作逐渐繁荣，队伍也慢慢壮大了。

但我想，主要原因恐怕还在于社会需要杂文，改革开放需要杂文。鲁迅当年为之战斗的那些痼疾，如今难道已全部退出舞台了么？并没有。社会的弊端，中国的民魂，古老的积习，新生的蛀虫，不正的风气，挡道的陈规陋习……作为社会哨兵的杂文作者，还有做不完的文章。再加上写杂文的人的心态也较前大为解放。这些，我想应是杂文看好的深层的原因罢。因此，虽然用以观察问题的可能是冷眼，用以发声的格调可能是冷言冷语，但相信这些哨兵们，这些社会主义的啦啦队们，他们那颗拳拳的心却是火热的。所以，我题之为：热心的冷言冷语。

（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法乎上 求其高

谚曰：“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如果也象水一样任其自流，舒服固然是舒服的，流到哪里就很难说了。

往高处走，当然没有自流那样省力、舒坦。比如我罢，就最怕“往高处走”。一次，在四川开会，同行者怂恿我登峨眉。我自知有不求“上”进的弱点，推辞不去。然终于拗不过热心人，就抱定“交门票主义”，去了。每到一地，把门票一交，就安坐车内，等他们“倦游”回来，才一同赋归。但真到了峨眉，却碰到了考验。一行到了两河口，空车就调头走了。导游宣布：万年寺过夜。从两河口、听音阁到万年寺，四公里山路，一万多石磴，呜呼！上天有路，回头无车。这下完了！无奈只得硬了头皮，找了保镖，服了“救心”，用比烧香老太还要慢的速度，勉强在晚饭前赶到。其时已是脸无人色，气喘如牛。虽则大有“三军过后尽开颜”的心情，然同时也发誓：下次那怕给我当万元户我也不“上”了。

这没有出息的经历，不免贻笑于大方之家。不过也足见往高处走，即使象开动“11号自备汽车”那样似乎是人人都是可以办到的事，尚且如此；如果换了要自学成才，发奋图

强，冲出亚洲，力争上游，那更是比走路、爬山要难得多了。

发这类老生常谈的感慨，为何？实不相瞒，我总觉得我们现在有些说法和做法，就有点鼓励自发论或自流论。比方被有些人讨厌的宣传教育，却常常强调所谓“受众的兴趣”。宣传要讲究效果，完全不看对象的需求，南辕北辙，当然不好。然而，光是顺着“受众的兴趣”，不讲引导，不讲提高，一味随波逐流，又如何能进百尺之竿头，以穷千里之目呢！

有人说报纸是传播信息的工具。但是，一张报纸版面有限，信息却浩如烟海。信息多种多样，对待信息的兴趣也多种多样。选择什么样的信息，满足何等样的兴趣，应该有客观标准：有助于实现四化的，符合群众长远利益的，合乎历史发展进程的。作为报纸的编辑——“把关人”，对此，恐怕不应认为是无可无不可的罢！

最近，受众评选十五种最佳杂志、刊物。细看结果，通俗文艺占了大宗。学术和理论刊物，除了一种普及型的以外，可说一本都没有。如说这十五种杂志反映了一种趣味，则是的；如说它们代表了我国刊物的水准，我想恐怕连投票的人都未必全会同意的。

思想工作要改革。耳提面命、拨苗助长等做法必须放弃。但是宣传、教育、疏导、提高等原则，还是不应由所谓的“无为而治”和“垂拱而治”来取代的。我以为如此。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五日）

“模糊学”的变种

“模糊”这概念，略带贬意，不讨人喜欢。但随着科学的进步，产生一门新的学科分支叫“模糊学”。一些很难明确分类的对象就用模糊学来加以研究。恕我说句外行话，比如土豆算主食呢还是副食？恐怕它就得归“模糊逻辑”来统计了。我这样自作聪明，不免要被行家嗤笑，但是诗既然允许“朦胧”，数学又为什么不能“模糊”呢！“假性近视”搞“雾视疗法”是否属于“模糊学”的应用，这就不得而知了。

一位画漫画的友人，曾教我一个诀窍：如若把一眼闭起，另一眼眯细，那末所看对象的特征部分反而清晰。如画人物，眯细着眼看那人的像片，次要部分模糊了，特征部分则凸现出来了，这时用一支粗大的毛笔把高颧骨、插颌腮等等一勾勒，寥寥几笔，人物既像又漫画化了。

这样说来，模糊数学是为了计算，模糊看法是为了清晰，清晰仍还是目的，“模糊”不过是某种手段而已。果真这样，我想原本就是清晰的东西，是大可以不必叫它模糊的。彩电荧屏清晰好还是模糊好？相机镜头是清晰好还是模

糊好？明明是一清二白的东西，故意弄得模模糊糊，这叫把水搅浑。当然，水浑也许便于捉鱼，“模糊捕鱼法”。然而把过滤水、食用水搞浑就毫无道理了。

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我认为总是应该肯定的。总结历史，评价人物，就不应搞“雾视法”。可惜的是，现在常常碰到这种“模糊学”。其法是：在好人身上挑刺找岔；向坏蛋脸上敷脂抹粉，就象鲁迅所说：“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

一分为二是普遍法则，然矛盾的两个侧面有主导与非主导之分，不讲这点，就抹煞了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就不分是非、善恶、好歹、美丑了。人有君子与小人、忠烈和叛徒、义士和奸细、巨人和侏儒、志士仁人和宵小蠹贼之分。但是有人说：“马克思是大人物，蒋介石也是‘大人物’”。“希特勒坏，为什么做到那末大？”如果都是这样搞“模糊学”人们还学历史干什么呢？秦桧也做过两任宰相的，也“那末大”？阮大铖的《燕子笺》，文笔也还不坏呢！相反，谈到鲁迅，居然有人油腔滑调地说他“搞极左”，把歌颂鲁迅和引证鲁迅的作品，嘻皮塌脸地丑化为“鲁货”。这不禁使人想起韩退之的诗：“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下面两句就是很多人熟悉的：“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那些“轻薄为文”的“群儿”，向不废江河吐口水的白痴，从来就有，不过最近似乎多看见了一些。

前不久有同志著文斥责美化西太后和张作霖，文章义正词严，读来痛快。其实也不一定非烈士本人或烈士后裔的眼睛才看得分明。正正派派的老百姓都是能够“明黑白，辨是

非”的。即通常说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只不过要请那些热衷搞历史“模糊学”的人，不要来训导群众，把水搅浑！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日）

干而论道

“坐而论道”——历来被认为是“说空话”或“只说不干”的同义词，被有些人瞧不起。其实呢，干当然是第一位的，但“道”和“理”，却又是行动的指南。光说不做，不好；但不能因此而不要“论道”和“讲大道理”。

实践出理论，理论反过来影响和推动实践。事情为什么这样做而不那样做，总得要讲出一个道理来。“合情合理”——合中国之国情，合马列主义之原理，再加上主观能动性，那末，什么事都办得成，做得好，行得通。

思想工作亦复如此。光说“这不行”“那不该”，耳提面命，算不得做思想工作。思想工作要有思想。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要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理。把道理讲清楚，相信思想也就可以打通。

鲁迅小说里有一批不讲理的典型。当然，如赵太爷之流，把他看作思想工作者，本身就是一桩笑料。他不讲道理的地方太多：阿Q为什么不能姓赵？他说不出个所以然，只会“满脸溅朱”，仗势欺人，训斥对方“不配姓赵”。《狂人日记》里的弟弟倒是一个颇能畅想和发挥的角色，只是围

绕着他的一些家人，包括他哥哥在内，却是蛮横无理和粗暴得可怕。比如有一天来了“一个年纪二十左右，相貌不太看得清楚的人”，在挡不住狂人三个“为什么”——“从来如此，便对么？”以后，便勃然变色道：“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这样的想思工作，连精神不正常的狂人尚且不服，何况健康人！

真理在握，才能摆事实，讲道理。姓赵，虽高居百家姓首位，但终究并无专利，别人为什么就“不配姓赵”了呢！

我们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改造社会的大事业。这样规模壮阔的改革，无疑要有深厚的理论为依据的。问题就是要对各类的实践从理论上加以阐发，说清楚。一个行动胜于一切纲领；但一切行动而没有纲领指导，却也不行。所以，干与道不能偏废。干而有道，才是“正道”！

当然，道如何论大有讲究。光讲“大道理”是不受欢迎的。文以载道，如不文，道也行之不远。绕开对象心里的“为什么”，把生动活泼的道理说得异常干瘪，也不是个好的思想工作者。当然，这已经是题外话了。我认为做思想工作，首先要坚持讲理论，讲道理。“演讲术”再好，如说得不在理，也是白搭。老百姓是辨黑白，明是非的，只要把道理说清楚，干而论道，相信一定能解决人们心中的疑难。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九日）

“南郭乐队”及其听众们

一直有点疑问，这些年会乐器的人，怎么这样多？记得少年时，也颇想附庸风雅，弄弄乐器。那时穷，琵琶、提琴买不起，吉他就是有钱也买不到。虽然国乐大师卫仲乐先生就住在隔壁的弄堂里，但没有乐器，也缴不起学费，难以从师。穷极之余，想到了洞箫。夫洞箫，价廉而物美。只须从伙食中省出相当于现时的几角钱，就能够“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既可寄托春怨秋思，又可充当骚人墨客，岂不美哉！

然而，光秃秃一段竹，上开几个洞，把嘴凑上去一吹，就能使鱼龙起舞，寡妇掉泪么？哼！记得光是能吹出声音，就化了两个月时间。还成了“不受欢迎的人”。每当我拿起洞箫时，同寝室的同学纷纷作“卷堂大散”。我独自一个坐在双层铺上，“嘘，嘘，嘘”地一直吹到头昏脑胀才罢。“无师通”是苦的，能把《梅花三弄》的头几句吹成腔，高中也快毕业了。至于吹会什么《妆台秋思》《鹧鸪飞》之类，大学都读完了。

正因为这样，我才不解：“四人帮”一倒，就冒出了那